

# 论 学 衡 派 (摘要)

南京大学历史系 张宪文

学衡派是二十年代在南京出现的一个封建复古主义派别。它是因东南大学几个教授创办《学衡》杂志而得名。这个杂志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开始发行，到一九三三年停刊，问世十二年之久。

为什么在二十年代又出现了“学衡”这个封建复古主义逆流，并且存在如此长久的时间呢？究其原因，是和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与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形势分不开的。

五四运动作为反封建运动，它的斗争并不彻底，它没有改变封建军阀的政治统治秩序，也没有彻底批判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体系，更没有清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毒害。旧意识、旧观念，因循守旧，迷信圣贤，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依然如故。这就给封建主义在中国继续泛滥，创造了条件。五四后，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重新加紧和封建军阀混战的加剧，封建复古主义者再次猖獗起来。

从《学衡》杂志发表的大量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代表封建主义者利益的。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的政治势力，同新文化、新思想进行殊死的斗争。他们不仅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早在这派复古主义者刚刚露头的时候，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估“学衡”》一文，给“学衡”派的先生们当头一棒，嘲笑他们是“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就连胡适也讥讽说：“没看见‘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

但是，长期以来，这派复古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有的人只认为他们是一个旧文学派，而没有注意到他们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坚持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因此，我们恰当估计“学衡派”在历史上的消极作用和意识形态领域中造成的危害，是十分必要的。

## 第一：学衡派维护封建专制主义

他们毫不隐讳自己的立场和政治观点，在《学衡》杂志的出版“宗旨”中，扬言“讲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们这里标榜的“国粹”、“真理”，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旧文化。也就是说，他们所要“昌明”的是旧传统、旧道德、旧思想。

他们是怎样致力于封建复古主义的呢？

### ①尊孔崇儒；

他们把孔子吹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说孔子是“中国文化惟一无二之代表”，“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他们把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和亚里士多德尊为“四圣”，说“此四圣者，实可谓为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最伟大之人物也，自此诸圣之生以迄今日，世界中之经验固皆导源于诸圣，即其生世以前，人类之经验，亦多藉诸圣为归宿，岂不伟哉”。他们把全人类辛勤创造的精神文明，都归功于这四个人，显然是对人类历史的极大歪曲。更可笑者，他们说孔子的学说“为全世界已往文化中最精粹之一部也”。实际上，儒家学说是集封建文化之大成，并且经过其后世信徒不断加以完善的。它是建筑在封建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并且为巩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封建专制经济制度服务的。

“学衡派”的一个成员，甚至公开扬言要做孔子的“辩护士”，诬蔑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凡可以致怨毒于孔子之词，无所不用其极”。他列举鸦片战争以来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藉以证明中国近世之病源，“非奉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甲午战争之后，国势日蹙，他说是因为是时“军县中无实行孔教者也”。这简直是极端荒唐的谬论。事实上，正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坚持以孔教为其统治工具，不能随历史发展而改弦更张，才使中国政治日益腐朽，社会日益衰败，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这难道与孔家儒教毫无关系吗？“学衡派”欲盖弥彰，恰恰暴露孔家店在二十世纪已成为中国历史前进的严重绊脚石，非把它搬开不可。

### ②坚持旧道德、旧观念：

他们公开声言要坚持封建的伦理道德，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鼓吹儒家的三纲五常。他们把禁锢人们手脚的沉重枷锁——礼教，视为中国的“国粹”和社会道德的“标准”。他们认为如果破坏了礼教，人们便可以“纵情任性，行事无所忌惮”，那么，就会出现“社会乱，生涯苦，文明亡，而人道息矣”。他们宣称人们需要礼教，“正犹航海者之需舵楫，登山者之需绳仗，寒冬之需裘，沙漠之需水”；只有遵循礼教，才能“造福人类”。因此，他们号召所谓“有志爱国”，“心存救世之士”，都要“立定脚跟，揭明宗旨，正言危行，拥护礼教”；并且宣言：“纵或因此而为反对者所唾骂，受绝大之牺牲，亦所甘心”，表现了“学衡派”要做封建礼教的殉葬品和与五四反封建运动对抗到底的决心。

“学衡派”还宣扬家族制度是“数千年社会之基础也”，“父慈子孝，人类道德之起点也”。从而对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冲击封建家族制度的个性解放、家庭革命、婚姻自主等，肆意歪曲和指责，斥之为“利用青年厌故喜新，好奇立异之弱点”，“以炫众沽名”，背离了封建的“中正之道”。

学衡派坚持封建的伦理纲常，道德名教，其谬论不一而足。他们的立场和态度，清楚地说明其对封建道德观念的崇拜和留恋。

### ③宣传宗教，提倡封建迷信：

“学衡派”从维护封建统治利益出发，连续不断地发表文章吹嘘宗教是“涵养精神生活之一要素也”；说人们“若身处逆境，或遭逢灾祸，其能发挥抵抗之勇气，得精神之安泰，则必赖诸一种超智识的力量是也”。那么，这个超智识的力量是什么呢？“崇教是赖焉”。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民主，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学衡派”则鼓吹“天”是

“全智全能之神”，迷信可以“启人善行”，这实际上是以鬼神之说，愚弄人民，推行反动的蒙昧主义，要人们安于愚昧无知状态，任封建统治阶级宰割而不要反抗。他们还宣扬超阶级的“爱”，要人们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爱敌如友，这对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是极其有害的。

“学衡派”不仅著文历数外国传教士在华的所谓“贡献”，说明宗教和科学可以并行不悖；而且论证儒教“无离奇之传说，无专制之教主，不立门户，不设阶级……收宗教之功，而无他教之弊”，因此是“最进步的宗教”，最“理想的宗教”。这说明“学衡派”不是对耶稣基督或释迦牟尼有什么真正的信仰，而是借题发挥，美化孔教，稳定人们对孔教的传统信念。归根结底，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继续统治张目的。

## 第二、“学衡派”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

“学衡派”要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恢复旧传统，必然要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二十年代，“学衡派”代表中国封建复古势力，再次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千方百计阻挠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 ①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攻击剩余价值理论

“学衡派”十分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影响。他们惊呼：“及至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一出，而肇世界资本制度之动摇，流风所说，不惟全欧为之骇汗失色，即全世界亦皆受其影响，今则此滚滚潮流，行且输入于此数千年老大守旧之吾国矣”。“学衡派”大肆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今日已成为一种陈旧之学说，且在学理上亦不能谓其有若何价值”，“完全失其科学上之根据”。显然，这些谬论都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领袖总结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尽管它的个别理论会随着革命运动的前进而有所变化，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将永远是人们从事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日益发挥其强大的生命力，而绝不是什么陈旧的学说。

“学衡派”对剩余价值学说横加歪曲，说它“在经济学理上亦极不当”，并举出种种理由，否定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甚至以有工人贵族的存在来否定资本家和劳工间的对立。他们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说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工人阶级的生活，虽还比不上资本家，但是“在晚近五十年来，已突进飞跃”，“工人实已沾资本制度之惠”，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工人阶级生活日益贫困化的科学论断。

“学衡派”一面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原理，称赞资本主义制度；一面又不遗余力地诽谤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他们说：“俄国自革命之兴，诸民族分离，裂为数十部落，国将不国矣”。他们甚至引用布尔什维克党叛徒的语言，攻击列宁领导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剥夺了无产者的自由，抑压工农远踰黑暗的帝俄时代。

“学衡派”费尽心机制造的种种谬论，无损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光辉，无损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更挽救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 ②鼓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他们借口“时代不同，国情异趋”，从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普遍真理的性质。他们认为马克思是“以其社会之症结所在，以定其治疗之方耳”，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

“天经地义，利诸四海而不悖也”。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谁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是“剿袭他人过去之主义，以说国众之必从，是犹削足而适履”，就是“作他人学说之奴隶”。

他们宣扬“中国之病，自有中国之病源，求之他国，必无一同”，借以反对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中国命运的指导思想。他们把中国的社会改造，比做是“久病求医，百药罔效，但闻奇方，无不思服，不知人之患病，体气各殊，原因互异，寒暑燥湿，初不相同，闻滋养而试参苓，见攻伐而投硝附，不问病情如何，但日时行之症宜尔，则其为医，有死而已，无生途也”。那么，改造中国的出路在那里呢？“学衡派”毫不隐瞒地声称：“吾国古先圣哲，自有大药良方，惜时人厌其陈旧，不肯服用耳”。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时势为借口，来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而且继续贩运封建的、唯心主义的货色，推行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

### 第三、学衡派全面否定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不断受到封建文化卫道者们的激烈反抗。但是，一个个都败下阵来。伟大的五四爱国群众运动，使封建主义者的复古活动不能不有所收敛，暂作喘息。一九二二年，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日益明显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而“学衡派”却再次向新文化运动发起挑战。

#### ①极力攻击新文化运动

“学衡派”从他们的杂志开始创刊起，到十余年后杂志快停办的时候止，一直没有中断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和诬蔑。他们诽谤中国先进分子提倡新文化运动，是抱有个人目的的，而广大参加者也是“激于一时之意气，以盲目之情感，而推波助流”；诬蔑新文化运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是“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餮我国之人”，是“专取一家之邪说”。他们歪曲历史事实，说新文化运动只是“轰震一时”，犹如“时鸟候虫，自鸣自止”，“而未能留深刻之印象于人脑海中”。他们说五四运动的结果，“除曹汝霖、章宗祥被殴外，更有何其他爱国影响耶”；新文化运动的结果，“除造成蔑视一切之怀疑派、纵欲任性之澜漫风，及摹欧仿美之恭洋派外，更有何其他贡献耶”。因此，他们的结论是，这场运动“无甚意义与价值。”

“学衡派”大声疾呼地说，要“指驳新文化运动之缺失谬误”，要寻求“改良补救之方”。那么，什么是他们改良补救中国的方法呢？他们表面上宣称，要“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实际上，他们讲的这个中西文明的“精华”，是中西方封建文化的溶合。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要“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再加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所论述，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这就不难看出，他们改造中国的方案，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依然不过是中西古代封建主义的一套，其目的是维持中国的封建传统而已。

#### ②崇尚封建文学，反对白话文的新诗体：

“学衡派”企图对新文学运动的成绩给予全盘否定。他们针对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文学八不主义，条条进行了批驳和歪曲。诚然，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有其局限性，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学衡派”攻

击胡适的文学主张，目的是要维护陈腐的、八股式的封建旧文学。胡适是第一个用白话写作新诗的尝试者，这在新诗的写作上起了开拓作用。他的白话诗选《尝试集》，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新的探索。而“学衡派”却攻击这种诗“似诗非诗，似词非词”，是“死文学也。其必死必朽也。”他们诬蔑新诗“语不沉着，但觉叫嚣是也，通篇读后，如闻里巷出丧所奏军乐，嘈杂震荡，无雅正之气，盖有体无格也。”因此，他们说：“白话运动之结果，除产生满纸‘的啦吗呀’之小说及散文诗外，更有何其他成绩可言耶。”

“学衡派”一面放肆地攻击新文学运动，一面大力鼓吹封建旧文学，极口称颂古文化，引导人们去崇古、怀古。他们说为古文就是“文之能真能美能善者也”；古诗就是“诗之能真能美能善者也”。他们极力号召学习古文，诵读古经，鼓吹经史子集“四部之中，每部但能熟精其一，已为终生受用不尽之学。”

由此可见，“学衡派”鄙视白话文，推崇文言文，反对新文学，提倡旧文学，都是为恢复封建旧传统，挽救动摇中的地主、买办阶级的封建统治服务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学衡派”的性质，不单是一个封建的文学团体，实际上是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中主张全面倒退的复古派。他们不仅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强烈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衡派”虽然不能倒转历史车轮，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二十年代“学衡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所起的消极作用及散布的不良影响。五四时期，封建复古势力的基地在北京，但是，“学衡派”却成了长江下游地区封建主义文化的顽固堡垒。前面我们讲到，鲁迅先生曾著文批判《学衡》，揭露了它的实质，但是，我们认为不能过高地估计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所起的积极作用。因为毕竟文章发表时间早，鲁迅先生还不可能全面认识“学衡派”的复古目的和活动。就是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也没有系统地批判他们的谬论，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他们的危害还认识不够。因此，五四后没有形成一个较大规模地批判复古主义的斗争。这也是“学衡派”得以较长时间存在的原因之一。

总之，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学衡派”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反作用，把中国现代史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深入一步。

## 安源工人大罢工的历史真相

南京大学历史系 姜 平

一九二二年全国闻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李立山等同志的长期准备，在刘少奇、李立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发动起来并取得胜利的。可是，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打着“高举”的旗号，把安源工人罢工史篡改得面目全非，他们非但完全抹煞刘少奇、李立三在领导安源罢工中的功绩，而且故意颠倒黑白，捏造罪名，诬陷刘少奇同志在安源罢工